责任编辑:邓聿文 E-mail:dengyw_008@sina.com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负责开展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子课题“健康风险对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影响研究”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已有农户调查数据集的基础上，利用固定观察点的网络抽样调查了吉林、甘肃、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浙江和广东等8个省1428个家庭，对其成员的健康风险进行回溯调查，尤其是大病、严重的慢性病和严重的损伤三方面的健康风险状况及农户的风险管理办法。数据的汇总分析结果显示——

# “大病”风险对农户影响深远

□海闻 高梦滔 姚洋

**●县医院是大病治疗的重点，新型合作医疗机构在费用控制和发挥“第三方付费监督”方面，重点的控制是在县级医院。**

**●农村的卫生保健工作应该足够重视“消化系统疾病”与“骨骼肌肉系统疾病”。对于45～54岁这个年龄段农村人群的健康应该特别关注，这是提高卫生投入收益的必要途径。**

**●妇女生育和生育以后的生殖健康应该引起重视，现在国家对于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关注较多，但对于农村妇女生育以后生殖健康保健重视不足。**

**●老年妇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中老年妇女是实施医疗救助的关键。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中，不能忽视医疗救助的作用。**

**●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中，要防止“逆向选择”。非贫困人群往往会选择治疗费用较高的方案，这也与医院盈利行为相契合的，结果就会使得最需要保险的贫困人群受益反而最少。**

**●“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贫困农户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减轻大病风险是关乎我国实现“中国战胜农村贫困”长远规划的关键所在。**

## 农户患大病的概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以2002年大病的构成情况看，发病率排列前两位的是“消化系统”和“骨骼肌肉系统疾病”，占22.2%和21.6%；但是从整个考察期的情况看，大病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化”系统疾病在期间内有所下降；而“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有所上升。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损伤与中毒”的情况从1995年起上升非常迅速，从1993年的3.4%激增到2002年的13.7%。和其他的大病相比，“损伤与中毒”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宣传教育与管理是能够避免的。性别和大病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男女的大病患病率的比例为1.09:1，男性略高于女性。男性的呼吸系统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为12.90%；7.60%；女性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发病率比男性要高，为14.10%：6.50%；总体排列前两位的消化系统与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男女发病率相差不大。

从大病患病人数的绝对量来说，各年龄段差异较大，“45-54岁组”、“35-44岁组”、“55-64岁组”、“65岁以上组”占全部大病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2.80%、18.80%、15.50%和13.90%，合计占71%；可以说在中国农村地区“中年”以后人群的健康状况出现急剧的下降。“45-54岁组”的大病负担最重，居前3位的疾病分别是“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从35岁以上人群的总体情况来看，“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病”疾病是健康恶化的重点。在农村35～64岁的人群普遍属于主要劳动力，“肌肉骨骼系统”的疾病负担会直接影响到生产和劳动的能力，从而对于整个家庭收入产生影响。

在本样本中，从事种植业的人群比重最大，相应地他们在大病患病人数中的比重也是最高，占患病人数的46.2%；无业与从事家务的人群次之，占17.6%；商业服务业、外出打工者、本地企业职工的大病比例都在5%～6%之间。种植业者主要的大病是“消化系病”与“肌肉骨骼系统”的疾病。无业或家务劳动者则是“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病”、“呼吸系统疾病”、“泌尿和生殖系统疾病”与“循环系统疾病”为主，并且5种疾病患病比例相差不大。

## 县医院是农户大病就诊的首选

样本中的农户患大病从感到有病到就诊的间隔平均为3.54个月，最长的拖延了6年才就诊。在区间内，大病就诊的间隔期不断下降。从1987年到2002年大病就诊的间隔期平均从3.25个月下降到了1.80个月。这体现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同时提高了医疗保障服务可及性与可得性。

但是不同收入组的就诊间隔情况非常不同，区间内低、中、高3个收入组平均就诊间隔分别为4.6/2.9/3.3个月。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就诊间隔在各年的变化非常大，总体有下降趋势。

农户的就诊机构大多集中在1～2家，只在1家机构就诊的占58.2%，在2家机构就诊的占29.3%，超过2家机构以上就诊的仅占12.5%。不同收入组对于就诊机构的选择极为不同，低收入组更多首选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中等与高收入组则首选县和县以上机构的居多。

对大病而言，无论哪个收入组，首选比例最高的依然是县级医院。治疗机构的选择在省际间的差异也非常大，浙江与广东两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选择乡镇卫生院治疗的比例高于其他几个省，这和当地乡镇卫生院较为发达，设备比较完善有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山西和甘肃两省，直接选择县医院治疗的比例最高。

按照年龄来看，就诊的医疗机构选择，主要劳动力和儿童的就诊在县和县以上医院的比例要高于老人组（从55岁以上开始下降）。老人组在乡镇卫生院就诊的比例与自我治疗的比例是最高的。

从农户全部到过的医疗机构来看，按照疾病系统分类的每种大病在县和县以上治疗过的比例几乎为100%，其中在县以上医疗机构治疗过的比例平均在20%以上。从这个情况看来，对于农村的大病医疗服务来说，主要的提供者还是县和县以上的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提供的更多是转诊和一些及时抢救的服务。

## 大病对患者的影响平均在6年以上

从花费的情况来衡量，治疗总花费最高的依次是“癌症”、“内分泌系统”和“损伤与中毒”；从患病的持续时间来看，“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疾病持续时间最长，基本都在10年以上。总体而言，大病对于患者平均的影响在6年以上。

对劳动时间影响最大的疾病是“骨骼肌肉系统”和“循环系统”疾病，分别是27个月与28个月。大病对于患病者本人的劳动时间影响平均在17.9个月。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平均在半年左右。“消化系统”与“骨骼肌肉系统”两种发病最高的大病，生活不能自理时间仅为2～3个月。

从大病治疗花费的情况来看，最为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是低收入组5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即使患了大病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平均而言，她们大病的治疗花费仅仅100多元。

## 大病对农户会产生两方面经济影响

大病对于农户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大病治疗直接对农户形成较大的经济负担，对于农户的储蓄和消费都有即期的影响；其二是大病对于农户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对于农户的长期收入与消费会产生影响。

大病发生当年对农户的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大病冲击的效果在患病第二和第三年显现出来，样本农户在患病后的第四年可比的收入水平才恢复到患病前一年的水平。大病对于农户收入的影响基本上持续2～3年，大致与大病的平均影响劳动的时间17.9个月相吻合。总体上看，家庭的消费支出在患病当年和患病的第二年有所下降，第三年就恢复到了患病前一年的水平。

没有借款的农户，在受到大病冲击之后的2年消费水平明显下降，而有借款的农户在大病冲击之后消费水平并没有经历明显下降的过程。在大病过后的几年中消费变化的波动幅度也比没有借款的农户小。可以初步认为，在大病冲击后的借款对农户平滑消费有明显作用。

农户经营支出受到大病影响的持续时间比消费支出受到影响的持续时间长，患病后的第5年恢复到患病前的水平。但是农户经营支出的回升要比收入的回升滞后一年。大病借款对于平滑经营支出的影响更甚于对平滑消费支出的影响。从大病冲击的当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4年，没用借款的农户的经营支出一直削减，而有借款的农户，经营支出基本维持大病冲击前的水平。

在样本中，因为大病而借款的样本户占了41.8%，平均借款金额为4360元。主要的借款来源是“亲戚”，占74.8%，其次是“信用社”和“朋友”，比例分别为9.4%和7.5%。低收入组的因病借款比例最高。从借款当年的基本家庭经济指标分析，治疗费用对低收入组造成的负担比其他两个组要重。其当年现金类资产仅仅能够支付全部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借款对于低收入组人群抵御大病健康风险要比其他两个组重要的多。

从还款的持续时间和还款的比例可以看出，高收入组农户的偿还能力明显强于其他两个收入组，预计还款期平均为2年。而低收入人群预计还清大病的借款需要将近4年的时间。

在样本中，患大病的患者有医疗保障的仅占了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例占59.7%，商业医疗保险的比例占15.3%，公费医疗与工伤保险占16.7%，其他形式的比例很小。从报销的情况来看，这些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功能非常弱。这体现在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较低；报销的费用与治疗支出相比，比例太小。

## 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和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政策上的启示：

1.县医院是大病治疗的重点，新型合作医疗机构在费用控制和发挥“第三方付费监督”方面，重点的控制是在县级医院。

2.农村的卫生保健工作应该足够重视“消化系统疾病”与“骨骼肌肉系统疾病”。对于45～54岁这个年龄段农村人群的健康应该特别关注，这是提高卫生投入收益的必要途径。

3.妇女生育和生育以后的生殖健康应该引起重视，现在国家对于新法接生和住院分娩关注较多，但对于农村妇女生育以后生殖健康保健重视不足。

4.老年妇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中老年妇女是实施医疗救助的关键。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中，不能忽视医疗救助的作用。

5.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中，要防止“逆向选择”。非贫困人群往往会选择治疗费用较高的方案，这也与医院盈利行为相契合的，结果就会使得最需要保险的贫困人群受益反而最少。

6.“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贫困农户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减轻大病风险是关乎我国实现“中国战胜农村贫困”长远规划的关键所在。

■调查研究

■有感而发

# 经济发展与安全事故

□邓聿文

重庆开县川东北气矿井喷事故虽然已经过去，但留给人们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如果说，这一事故给安全监管当局的最大触动是“必须尽快建立起国家级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预警机制和应急救援体系”（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语）的话，那么，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思索则是：安全事故的频发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回顾2003年，从年初的黑龙江特大瓦斯爆炸到年中的山西运城矿难，再到江西丰城矿难，一直到这回的井喷事故，矿难频频发生，还有烟花爆炸事故等。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惊闻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安全环保彩光声响有限责任公司12月30日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35人。

若再把眼光放远点，近年来，我国似乎是进入了一个事故高发期。统计显示，2001年我国共发生各类事故1000629起，死亡130491人，比2000年分别上升20%和10%以上。2002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又高于2001年，仅矿山安全事故就达2000多起，造成近4000人死亡。2003年看来又将创出一个事故和死亡人数的“双新高”。从近年的平均统计数据看，我国每天各类事故造成300人丧生，每年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

为什么在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安全事故却频繁发生？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还只是一种偶然情况？

安全专家认为，工伤事故状况与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我们看到，农业经济时代是没有这么高频率的安全事故的，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惩罚”。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现在每年产商品煤十亿吨左右，每年工伤事故死亡30人左右。英、德、法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而且像韩国、巴西、印度等国曾经或正在经历这段历史进程。

由此看来，中国似乎也很难越过这个发展阶段。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

事实上，分析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有关数据，会发现，两者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当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时，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指数也明显上升；而经济增长幅度下降，死亡人数指数也跟着降低。目前，我国人均GDP刚达到1000美元左右，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较快，据此推算，近期我国工伤死亡人数很难出现明显下降。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对居高不下的事故和死亡率束手无策。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美国煤矿业也经历了一个从事故多发到加强立法和管理、最终进入安全生产时期的过程。如上所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煤矿事故。1907年，发生在主要产煤州西弗吉尼亚的一起煤矿爆炸事故，死亡362人，创美国历史之最。这次煤矿事故促使美国国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加强安全管理。1910年美国设立了矿业局，其基本任务是制定安全标准、监督生产、加强检查、调查处理事故和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围绕煤矿生产美国先后制定了10多部法律，安全标准越来越高。其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制定的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法，对所有矿业生产进行了全面和严格的规定。这一法律的出台标志美国煤矿业生产走上事故低发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美国煤矿安全部门执法非常严格，如果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雇主将受到惩罚。若发生一起死亡事故或发现故意违法行为，可罚款7万美元；若发现几起类似的故意违法行为，最高罚款额可达7百万美元，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正由于采取了这些严厉措施，美国煤矿的事故率才得以大大减少。

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战略，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可能以压缩经济总量，放慢增长速度，减少第二产业比重来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也很难要求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增加超出承受力的投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要迅速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尤其要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的势头。所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管理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就显得特别重要。

■专家视线

# 关于现代化的浪漫主义

**在不发达国家，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常常表现为对“现代化”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加上鲁莽，就要惹出大麻烦**

□党国英

在各种浪漫主义中，大概对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值得警惕。在不发达国家，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常常表现为对“现代化”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加上鲁莽，就要惹出大麻烦。过去的伊朗，还有一些拉美国家都有这种教训。

中国过去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有一个表现，就是拿几种产品的产量作为现代化的指标，然后很鲁莽地推动产量的提高。例如，钢铁可以造兵器，粮食可以安定国家，于是，钢铁和粮食的产量便成了赶上英国的指标。一度我们是很乐观的，以至考虑粮食多了要让农民多吃几顿饭。这个浪漫主义过了头，其后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现在我们的钢产量上来了，早已超过了英国。我们也聪明了一些，再不拿钢产量说事。但浪漫情怀却有了更好的表现方式，一些地方、一些人主张要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化。

既然讲现代化，而且要在国际上去比较，那就承认了这样几个比较的内涵：第一，世界上的人民是相似的，是可以比较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影响他们的共同追求。第二，各国人民的追求应该有最基本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有他们共同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这些标准就是自由、民主、安全、健康和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第三，现代化不是少数人或几个城市孤岛的现代化，而是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例如，13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拿其中900万人口的收入来计算有关指数，那恐怕是不行的。

公允而论，构成现代化内涵的这几个方面，近二十年中国获得了极大改善。中国人的自由与民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好。但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在这几个方面还远不成熟，它们也在艰苦改革。

中国短期内要超越发达国家是很难的，邓小平曾经对此有过论述。欧洲发展到这个程度，有它自己的历史渊源，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社会的自治传统。要两方面来理解这个自治。一是各层次的政府的自治。欧洲的大帝国统治的时间要远远短于中国，而且也远没有遍及整个欧洲。后来有短时期的王权崛起，在西欧，时间最长的也就两三百年吧，而且那王权的权威也小于中国的皇权。二是民间社会的自治。在苏格兰的传统社会，一个贵族骑马进入农田，哪怕这农田是自己的领地，也会遭到农民的嘘声，被农民赶走。Community（共同体）这个词在西欧社会很有年头，它反映了这种社会组织很早就是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由于自治传统根深蒂固，公共事务的处理通过协商来解决，并由此发展出民主的各种形式。民主制度给个人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同时也要求法律对个人的约束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这一环套一环的制度内涵，不是一下两下可以学来的。

中国人想现代化，另一个原因是想一扫几百年国际战争中失败的晦气，让自己强大起来，特别是军事上强大起来。西欧人在几百年前开始对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实行殖民扩张，以其军事力量打遍世界，几乎是所向披靡。研究世界战争的一位西方学者说，先进武器（特别是远洋舰队）、严格纪律和充分的后勤保障这三条，是西欧人战争制胜的三大秘诀，但满清政府也没有学到人家这个，所以我们没有打过人家。学来这个东西的，在亚洲大概是日本。日本是个小国，先主要学西欧的皮毛（明治维新开始），后学西欧的制度（二战以后），是能讲得通的，但中国不行。所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那样的人物不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把西方的战争优势归为先进武器、严格纪律和充分的后勤保障，这也只是看到了皮毛。深层的原因是，它们那个社会本来（至少在几百年前）就有战争机器的性质——这是我后来读书的一个体会。封建制度是瓜分战争胜利果实的一种制度，瓜分完毕，服务于战争的社会结构还是不倒。这个特点，在英国社会的历史上表现很突出。从11世纪开始，英格兰人保持战争的社会动员形态，连续4个世纪攻打周边民族或国家，再后来才出击欧洲之外的地方。但是，它们的这种战争机器，又是一个没有常备军的战争机器。而且，战争动员中的军事权威恰恰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高度自治并行不悖。这种社会结构才造就了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为这种结构有利于技术进步。一言以蔽之，战争的强势来自社会的强势，这也不是后进国家一下子可以学来的。

还有那种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往来，我们也不是一下子能学来的。我想起在哥拉斯哥街头与一位福建偷渡客的谈话。这个福建同胞几年前偷渡至此，不能讲英语。他靠卖一种自己发明的竹哨为生，每天进账颇丰，还不纳税。他有一番抱负，要在英国挣大钱。他说，洋人头脑简单，好打交道，容易信任人，生意好做。他卖哨子，洋人从来不试一试就买走，原因呢，是洋人怕在试哨子的时候吵别人。但他不停地吹哨，吸引顾客。他更深的体会是，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只要在这里住久了，也会变得头脑简单。这位老兄不怕自己头脑简单，蛮有信心地要大挣头脑简单的英国人的钱。其实，这福建老兄讲的实际上是英国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他也懂这一点。比较起来，我们的高楼大厦、洋派建筑一座一座起来了，但我们能在短期内筑就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彼此信任的社会关系么？

要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如果不出差错，关键的改革要能顺利过关，一切的一切尽如人意，我看至少要50年以上的时间。30年我们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大飞跃，同时小心翼翼地实现社会转型；再用20年补课，大体就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局面。而发达国家呢，仅仅它的社会需求和劳动成本就限制了他的发展；它已经进入一个超稳态的社会阶段，不会有高的发展速度了。

聚群英智慧 创时代业绩
群英会集团
电话:(0377)3039601 传真:(0377)3039606
E-mail:qunyinghui@tobaccoha.com.cn